

芳草文库

周翼南文集

② 人物志

周翼南

著



抽象主义画派创始人之一、
对后抽象主义的发展

有较大影响的康定斯基曾说：

「艺术作品包含两个因素：

内在的和外在的。

内在的因素是

艺术家灵魂中的感情；

这种感情有力量激发

观众同样的感情。」

他强调：「内在的因素，

即感情，

必须存在；

否则，艺术作品是赝品。」

——《我的「创作谈」》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周翼南 著

周翼南文集 ②

人物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翼南文集.人物志/周翼南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2
芳草文库

ISBN 978-7-307-20657-1

I.周… II.周… III.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80818 号

责任编辑:黄 殊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箱: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23 字数:423千字 插页:3

版次: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20657-1 定价:155.00元(全3册)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芳草文库》序

刘醒龙

武汉有一批年纪不算太老，但肯定不再年轻的作家，既往作品每出无不风行江汉，后来平淡了些。二〇一五年初，恰逢一场小聚，其间有老朋友提议给这些在文学创作上颇有成就的作家出版文集，且当场做出关键决策。老朋友提及的作家也是我的朋友，他们的处境很有代表性。

世事流逝到今天，说一点不残酷是不真实的，说太残酷似乎也不科学。值此宁翔雁前羞跟牛后世风，普天下之莫不借口追求日新月异，其实是乡下俗语说的，人人都想一锄头挖出一口井。宁肯臭名远播，哪管丑态百出。忘却不该忘却的，强化不该强化的，是世情中一大不敬。这几年为一位已故作家出版文集，好不容易才成，一来二往之间，见识了足够多的现世生态。似这等才华出众的作家，若非上苍失察，弃之英年，敢不是当今文坛大旗一帜？同理，那些在喧嚣背后悄然尘封的作品，谁能说不是日后人有所诵的典范？天地同根，不是没有高下之分，而是天有天的 height，地有地的厚重。

常住武汉三镇之人，最能体会大江东去、流水落花深意。也是体恤的缘故，又于旷野之间留下高山流水千古知音，以为勉励，兼作念想。朋友提议，饱含诗情，深藏灵性。没有太多商量，三言两语之间，就达成共识，以《芳草》杂志名义，逐年排选，将这批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编成文集出版。只是由于执业所限，本套书只能以《芳草文库》相称，名头虽小，相信分量不轻。

哲学教会人们认知正确与错误，自然科学是要让人懂得成功与失败。然而，短短人生，包罗万象，其善其美，何止兴衰胜败！文学的存世与流传，其意义正是超然前二者，不以成败对错为目的，也不以卑微尊贵定价值。人非草木，却如同草木，这是文学理由之一，生命不能永恒，却绝对永恒，这是文学理由之二。文学根本理由是，协助芸芸众生在庞杂得无可把握的宇宙间，在神与鬼、灵与欲、虚与实等一切冲突与对立之间，寻找适合每一个体的美妙平衡。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五日

周翼南文集

第二卷 人物志

目 录

白发在阳光下闪耀 ——记诗人曾卓	/ 355
刃口上的生命 ——王振武祭	/ 384
妻子	/ 442
胡风同志访问记	/ 451
冰心	/ 455
孙犁的书法	/ 457
访张光年先生	/ 459
严文井	/ 462
汪曾祺的画	/ 464
黄裳先生	/ 466
悼荻帆师	/ 468
诗人绿原	/ 470
大家黄永玉	/ 472
何满子的书法	/ 475
李準的书法	/ 477
韩羽师	/ 480
全才的高莽	/ 482
“老顽童”牧惠	/ 484
唐达成的书画	/ 486
五峰山人鲁光	/ 488
画家韩美林	/ 491
访苏东天	/ 493
江国祥和“禅画”	/ 496

楚天之风	
——记薛楚凤先生	/ 499
徐松安	/ 502
姚老赠诗	/ 503
周韶华	/ 506
冯今松	/ 508
骆文同志	/ 510
艺术家程云	/ 513
曾卓	
——老水手敞开他的心	/ 515
松涛老人谈养生	/ 517
老画家吴越	/ 519
书道大家吴丈蜀	/ 521
老画家汤文选	/ 524
鲁慕迅	/ 529
邵声朗和《早春图》	/ 531
无争无求的王文农	/ 533
画家韩柏村	/ 535
刘一原	/ 538
谢申	/ 541
樊枫	/ 545
江虹	/ 547
易至群	/ 549
施江城	/ 551
画家沈爱其轶事	/ 553
李世南	/ 563
想念唐翼明	/ 565
建纲其人	/ 569
“三观居士”罗维扬	/ 571
淡泊的维洲	/ 573
忆姜天民	/ 575
想念孺乾	/ 577

江岳画马记	/ 579
黄德琳	/ 581
张少华	/ 583
周代	/ 585
作家楚奇	/ 587
我与贤敏	/ 590
梅志	/ 593
谢蔚明	/ 595
牛汉	/ 597
程千帆	/ 599
姜德明	/ 601
包立民	/ 603
龚明德	/ 606
马昌仪 刘锡诚	/ 608
启功	/ 611
倪墨炎	/ 613
王成玉	/ 615
王生才	/ 617
贺飞白	/ 619
沈伟	/ 621
刘绪源	/ 623
贾植芳	/ 625
钟敬文	/ 627
黄永厚	/ 629
刘文湛	/ 633
聂干因	/ 635
左汉桥	/ 637
季酉辰	/ 639
刘二刚	/ 641
马得	/ 643
徐乐乐	/ 645
朱新建	/ 647
怀一	/ 649

人生四梦	/ 651
说脸谱	/ 654
谈藏画	/ 656
说“润格”	/ 659
诗书画印	/ 661
我与歌	/ 667
我与摄影	/ 669
我与画	/ 671
我的“自白”	/ 674
我的“书房画室”	/ 677
蝈蝈儿	/ 679
鸟巢	/ 682
《秋菊集》序	/ 684
我与《芳草》	/ 687
三多居琐记	/ 696

白发在阳光下闪耀

——记诗人曾卓

这篇东西写于1979年6月。写时不曾想到发表——那时似无发表的可能。现在拿出来也未作修改和补充，因为刚刚逝去的历史使任何修改和补充都显得多余。

这是一篇人的特写。我愿意说，虽然写得不好，但里边凝聚着我和我的几个友人真挚的感情。关于我写的这个人，读者们还是通过他的作品去了解他吧。自从女诗人柯岩在四次文代会上朗诵了他的《悬崖边的树》这首诗以来，他已在各地报刊上发表了許多诗，还有散文、书评……他甚至执笔写了一个关于莫扎特的广播剧。去年二月，他的诗集《悬崖边的树》和散文集《美的寻求者》相继问世。今年他正准备编一本新的诗集和一本新的散文集。他进入六十岁了，但他好像面临着艺术生命的春天。

倘说这篇东西有它存在的价值，那是因为它写了一个真实的人。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写了曾经有这样的两代人走过了这样艰难坎坷的路。也许，它可以当做后人了解过去的一份记录。

我真诚地希望，我们不再作这样的记录，我们的后代不再走这样的路。

1983年春

我没有想到现在就能写这篇文章。原来，我想：写它应该是在许多年以后；而且，写了也未必能够示人——除了几个时间证明是可以生死与共的朋友；至于发表，那是我想都不敢想的。

这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并不难理解。因为我要写一个人，他的遭遇异常之特殊，我不知道能不能使用“绝无仅有”这种说法。

他的名字，对于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来说，未必熟悉；但年纪稍大一点的人——特别在湖北武汉——大都有所闻，他叫曾卓。他是一位诗人。由于受到株连，他卷入1955年一场大的“运动”的漩涡之中，这使一个人——一个过去为

人民战斗过、善良而又真挚的人——沉沦了二十多年，几乎是四分之一世纪。哦，四分之一世纪并不算长，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可是对于曾卓，却在无望和苦难之中经历了青年、中年和老年这三个阶段。二十四年以前，他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共产党员，武汉市文联的负责人之一；二十四年以后的今天，他已经满头银发了，虽然他只有五十七岁。

他生命中最好的年华有一半是在过去的黑暗中用战斗度过的，另一半是在他过去所盼望的明天里。



命运（我常常觉得它是存在的）常赋予人们以各种意外的机缘和想象不到的偶然性。它使曾卓在 50 年代中期消失在一场政治运动的旋涡之中。它也使我在 60 年代初期（那时我二十一岁）认识了他。尽管我们隔着相距很远的岁月的壕堑，我却成了他可以信任的、年轻的朋友。在 1975 年，中国处在动荡和搏斗之中的时候，他曾送给我一张他于 1953 年拍摄的照片，那是一张头像——他戴着一顶普通的解放帽，穿着白衬衣，辽阔无际的天空衬着他年轻的脸，他的眼睛微眯着，沉着地凝望着前方……

在照片的反面，他为我写了这几行字：

他当时凝望着前面
他不知道——绝没有想到
将在一条不平坦的道路上
度过漫长的二十年

每当我看着这张照片，我的心中便涌起难忍的痛楚……



我很喜欢读一些回忆录之类的书，例如高尔基的回忆录，我以为是高尔基最好的作品；而屠格涅夫的回忆录，当它在“破四旧”时被抄走之后，我心疼了好几天；《居里夫人传》虽属传记，但却是她女儿对她的回忆，这本书是我学生时代所读的最好的书之一；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纪念》这两篇文章曾使我流下眼泪。

但我，却从未写过回忆什么人之类的文章。首先在于我是一个无闻的、还未进“不惑之年”的人，我没有资格写这类文章。我总以为写这类文章，回忆者和被回忆者都必须有相称的身份，例如高尔基回忆列宁、屠格涅夫回忆别林斯基；《居里夫人传》又当别论，是女儿回忆母亲，这关系的特殊为任何人不能代替；至于鲁迅先生的文章，我想是不需我多说的了。

二则是有“盖棺论定”这么一句话。这话虽不科学，但延伸到现在。似乎一个人只有离开人世，另外的人才能论及他的生平，这话也许有些道理，“晚节不忠”和“蜕化变质”的例子确也不少。而且，倘若一个活着的人要我为他作传，我也会极不高兴——这种要求只有古代的埃及法老才会有——法老们倒是在活着的时候就叫奴隶做金字塔的。

但我现在却要写曾卓了，尽管他从未有这样的要求，我却犯了自己的禁忌，因为他还活着。在1962年之前，他对于我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印象，我也不可能知道，他在我以后的生活中竟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是的，我要写他，这是我活着的心愿之一。这是为了他，也并非完全为了他。

三

我是在1962年认识他的，那时我二十一岁，刚刚走进生活，在一所小学里教书。工作之余，我写了一个历史题材的电影剧本，这个剧本引起武汉市文联负责同志的关注，他们委托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的创作组观阅和讨论。

我参加了那次讨论会，在剧院一间荫凉的小房里，当时剧院的院长是热情的莎莱同志，她给我介绍了创作组的成员，一共是五个人，其中就有曾卓。

我惊愕地听到了这个很可怕的名字。在十多年以后，我记得曾卓也说过他名字的可怕，他是带着笑意幽默地对我说的：

“我的名字不好，曾国藩的曾，董卓的卓，唔，真可怕哩。”

这是十几年以后的事。但在当时，我既没有想到曾国藩，也未想到董卓，我只想到胡风。而胡风当时几乎就是“反革命”的同义语。“胡风分子”当然也就是反革命分子。曾卓既然是“胡风分子”，他当然也就是反革命分子了。然而这个“反革命分子”却是艺术剧院创作组的成员，不仅如此，他此刻正站在我的面前——自我出世以来，第一次面对着一个活生生的“反革命”——他还参加我的剧本的讨论会。我是惊愕的，我不知道我当时脸上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

但，我还是同他握手了，他的手是温热的，手上既没有无声手枪，也没有暗杀的匕首。他一点也不像一个“反革命”，他是一个头发开始发白的中年人，矮矮的，穿着很随便，样子很和气，留着稀稀拉拉的胡茬子，我估计他快五十岁了，实际上他那时才四十岁。当时正是夏天，很热，他却穿着一双很旧的不透气的黑皮鞋。

关于那次讨论会的详情我已经不记得了，我曾经记在日记本上，但我的日记本和我幼稚的习作都在动荡的十年之中灰飞烟灭，曾卓那天是最后一个发言，我记得他的发言使我折服，我还记得他和善的目光和诚恳的语气。

我那时认识了几个武汉的作家和诗人。作家 A 是很重视我的，他总是要我写，不断地写。我也认识诗人 B，他有很高的前额，个子也很高，在他面前，我总感到拘谨。

在文学的道路上，我还是一个孩子，何况这条路又是如此崎岖不平（后来几乎变成一条羊肠小道：一边临着“黑八论”的深渊，一边竖着使人魄动的“三突出”的陡壁），我很需要人搀扶和引路。我也极需要汲取一些有益的营养使自己健壮起来。作家 A 家里倒有很多书，他是写小说的，有全套的、各种版本的巴尔扎克的作品，但他并未推荐给我看。他只是要我写、不停地写，我仅鼓起勇气向他借过一本司蒂芬·茨威格的《巴尔扎克传》，这本书确实给我增添了奋斗下去的力量。诗人 B 家里也有很多的书，都是崭新的，整齐地摆在闪光的书柜中，我发现他家的一切好像都不可轻易移动，都待在它们应该待的地方，这使我坐在他家时也不敢动一下，老老实实在地坐着，别说什么借书了，我只能聆听着诗人 B 谈诗，当 B 谈诗的时候，我总是用羡慕的眼光斜视着那高大的、闪光的书柜。

我却从曾卓温热的手中接过许许多多很好的、他挑选的书籍，这些书极大地丰富了我的心灵和头脑。他总是微笑着简单地对我说：“这本书不错，你拿去看看，认真看看。”

然后，往往是一本很旧的、他看过许多遍的书送到我的手中，我从他手里接过了梅林的《马克思传》、卢森堡的《狱中书简》、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卢那察尔斯基的《论俄罗斯古典作家》以及许多古典名著，总之，我可以列出很长很长的书目。

他的家在外边，那时，剧院里有一间供他写作用的小房。1962 年的艺术剧院不像今天的歌舞剧院，走进不去不必通过峡谷般的八层楼，人也比现在少——现在剧院的人似乎增加了十倍——院里是一片绿荫，不时传来悦耳的琴音和悠扬的歌声，知了不知疲倦地叫着，这单调的蝉鸣不知怎么反而给人一种静谧的感觉。

开始，我总是带着警惕心和好奇心走进他小小的房间。但很快地，这两种心

情都使我脸红。曾卓热情而笨拙地接待我。倘若我拘谨，他就不安；倘若我不安，他便痛苦了。在我同他熟识起来后，我常常看到这种情况：他尽力地使到他家的客人（甚至他不喜欢和讨厌的人）自在和舒适，他能敏感地站在别人的地位来体验别人的心情，只是——我觉得——他在这时往往显得有点笨拙罢了，那是孩子般的笨拙，只有在谈论文学时他才显示出他是一个可敬的长者。文学是他的生命和血，在任何时候都给他以力量。

那间小房异常简朴：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几只凳子和两个很旧的藤书架，一切都显示着它们实实在在的用途。书架上放满了书，放不下的书便散乱地放在床上、桌上和凳子上。房间里唯一没有明显用途的物品是书桌上一只乳黄色的石钟，搁在紫檀木座上，似乎是古玩，朴质而厚实。这古玩现在还待在他家中，一直跟随着他，但我从未问过它的来历。我总想问一问，但总是又忘了——当我同曾卓交谈的时候，一切多余的、没有意义的事物便消逝得无影无踪。当然，这只石钟对于曾卓来说也许并不多余而且是有意义的，但我现在不知道。

最近我买了一本很好的书：《歌德谈话录》，使我想到，要是把曾卓从那时起到现在对我说的有关文学的话记下来该多好。虽然他并不是歌德（我也并不希望他是“歌德”）。他在文学和艺术上有许多深刻的、执著的见解。这些见解都有机地包含在他对许多作家和作品的看法之中，他同我交谈时则从他心里喷涌出来。例如他对我谈过雷马克及他的《凯旋门》，他是谈资产阶级作家的悲剧时谈到雷马克的。1979年3月，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三个春天，沉沦二十四年的曾卓第一次发表他的作品，这作品既不是诗、也不是小说，而是一篇书评：《阴影中的〈凯旋门〉》。这篇短短的书评使那本《外国文学研究》得到了不常有的分量，因为里面袒露着一个诗人真实的感受和真实的心。如果你认真阅读这篇文章，你会知道曾卓为什么选中这篇书评同世人重新见面。

书评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动荡的艰难的生涯中，能真正为人所爱是一种幸福，一种慰藉，一种温暖；是夜行中的星光，是风雪中的茅屋，是沙漠中的清泉。

啊，从1955年起，曾卓就过着一种艰难而动荡的生涯，这种情况延续了二十多年。二十多年处在无望之中，对于一个脆弱而没有信念的人是会发疯和倒下的。他却活到今天。他曾像一棵大树一样被暴风雨反复摇曳，但未被连根拔起——像许许多多含冤离去的人们。这是侥幸么？不。这是由于他植根于爱的土壤，他爱亲爱的祖国和亲爱的人民、爱真理和爱未来，他自己也被人所爱——他的亲人和他不同年龄的朋友。因此他依然拥有幸福、获取慰藉、得到温暖，也得到力量——无论是夜行中、风雪中和沙漠中，这种力量，这种爱的力量，使他顽

强地生活和探索下去，一直走到今天。

四

1978年冬天，我认识了一个头发也开始发白的作家，他竟对我说过这样一段使我惊奇的话：

“你知道是谁使我走上文学的道路么？我要感谢一个人，我可以告诉你他的名字——他叫曾卓……”

他的语气是异常沉痛的。柔和的灯光投射到他有着许多皱纹的脸上，淡淡的眉毛微皱着，眼睛凝望着空间——似乎他想看到他难以遗忘的过去。那时，他年轻而幼稚，刚开始在文学的道路上行走。

他用这种沉重的调子叙述下去。他说，在1949年前他写了一首诗寄给报刊，不久收到一封热情的、肯定的信，诗后来也在报纸上发表了。这信便是曾卓写给他的——曾卓那时是报纸的编辑。此后曾卓约他谈话，帮助他，使他获得自信，逐步成长起来……

“可是，在1955年以后，我就不敢同他见面了。我想看他，我知道事情并不是那样，可是不能，不能！”他继续说，痛苦中含着愤怒。“如果是1949年前，一个同志遭到不幸，我们可以冒着生命危险去看他，帮助他；可是现在，却不能，不能去！——谁说社会主义里没有悲剧？这就是最深刻的悲剧！……啊，很多事情是多么值得我们深思啊！”

他说着，这些话仿佛一直郁积在他胸中，二十多年不能倾吐出来——他还不知道我认识曾卓。

另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某刊物的女编辑这样对我谈到曾卓，用一种同情的调子：

“我知道他，过去见过，他那时是市文联的副主席。他很和善，很容易相处的。他没有架子——一点架子也没有。”

从1962年到现在，我觉得曾卓的样子都没有变什么，他总是那个样子。他的衣着总是松松垮垮的，上衣揉得很皱，裤子上没有什么“刀片”，我很难想象他穿上一套整整齐齐的、崭新的服装——倘若他的妻子给他穿上，那么，他便像一个在舞台上手足无措的、不称职的演员。他长得一点也不漂亮，但一点也不丑陋，那只略大的柔和的鼻子显出了他的善良；他有一张轮廓很鲜明的嘴，嘴边常带着一丝宁静的笑意；他的眼睛是明澈的，使人感到愉快和亲切；他那稀疏的白

发不可能盖住他饱经忧患的前额——开阔的前额上满是岁月刻上的皱纹，这皱纹仿佛像是大树的年轮一般。

他和任何人谈话都是用一种平等的、和善的、朋友般的语气，如果他要对你提出什么意见——那一定是经过了他好几天思考的。

他的整个形象都显示他是曾卓，是他自己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就像高尔基谈到契诃夫时所说的：“他永远是他自己。”

60年代初期我刚刚认识他的时候，我对他的过去一点也不了解，我不了解他在1949年前就是一个有名气的诗人，也不知道他二十六岁就担任武汉市委宣传部的文艺处长，更不知道李尔重担任武汉市文联主席时他就是副主席，也不曾听说著名诗人邹荻帆是他的好友……他过去的战斗经历、他的职务、他的朋友都在那样一个可怕的定语面前消逝了，我不知道他怎么成了武汉艺术剧院创作组的成员，而且那时他写的多幕话剧《江姐》——这是全国第一个根据《红岩》改编的剧本，当时夏衍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推荐过——正在武汉上演。然而大幅海报上的作者名字却是“曾庆冠”，后来有人上纲分析为“这是曾卓庆祝自己摘掉胡风分子的帽子”，实际上这是他的真名，从小就使用的，我常常钦佩那些善于上纲的人们想象力和联想力的丰富。总之，这样一些情况使我迷惑不解，年轻的我也不好问谁，我便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这本不同寻常的书和一个普普通通的、善良而真诚的曾卓之间痛苦地徘徊。

在我们年龄相仿的文学朋友之间，也常常因此出现不快和口角。有的人比我更早地认识曾卓，他们尊敬和爱他；有的人却对曾卓退避三舍，仿佛曾卓身上会传来使人致死的病菌。这两者是很难调和的，使我感到茫然。那时我偶然见到一本揭发曾卓“罪行”的、1955年的杂志，如果它所提供的一切是真实的，那么曾卓便十恶不赦了，我是不能不信的。党的刊物难道能怀疑么？何况曾卓的名字上了那本很重要的书，没有依据怎么可能说他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

那么——当时我想——是曾卓在对我“耍两面派手法”而来“毒害”我了。我也曾看到过一篇“揭发”他如何“毒害青年”的文章。这使我经常苦恼地思索和检查曾卓是否有企图“毒害”我的地方，虽然这样想使我感到很对不起他。

然而——当时我感到——曾卓并没有把自己的问题看得那么严重，他似乎从来没有想到一个接触他的青年会有这样的矛盾心情和苦恼。他是如此坦然而又宁静，他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他的学习和创作之中，他的房间里满是他翻阅的书籍，他桌上总是放着写满字迹的稿纸。当你进入这间荫凉的、有着绿纱窗的小房，听着他用温和而沉着的语调叙述他对某个作家或者某个作品的见解时，你马上就忘了那些使你感到困惑而苦恼的事，你只知道你面前坐着一个可亲的朋友和